

蒙元时期云南移民的民族互嵌与地域认同

朱贵芳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蒙元时期中原王朝对云南的开发、经营力度逐渐加大,进入云南的移民群体数量剧增,其结果使得中原与云南的社会整合及族群融合态势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镇戍、仕宦、谪迁、商旅等方式迁入云南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女真等移民主要分布于治所、屯地、站赤、驿堡、铺舍、哨所等地的施治网络周围,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与土著族群杂居的分布格局,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形成民族互嵌的格局,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推动云南地区华夏化的进程,同时逐步增强移民对云南地区的地域认同。

关键词:民族互嵌;蒙元时期;移民;土著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23)09-0146-05

新时代民族工作要求促进民族的交流与融合,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1]。民族互嵌是一个新兴的概念,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当代民族互嵌的基本范畴研究、社区建设、社会结构以及与民族关系等方面^[2]。虽有学者已注意到民族互嵌的格局是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但研究主要聚焦于明清时期某一地区卫所的民族互嵌情况^[3]。蒙元时期(公元1253—1382年)是云南地区华夷冲突与融合,构筑稳定华夷关系的关键时期,也是云南与中原王朝进行社会整合及族群融合的关键时期。蒙元时期大量军队、仕宦等带有施治目的的移民群体进入云南地区,不仅增加了移民与土著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更是促进了移民对云南地区的地域认同,在构建民族互嵌格局的过程中推动土著群体的华夏化进程,助力云南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有的研究成果详细地分析了历史时期移民的类型、族群结构、文化交流等^[4]。目前研究成果虽涉及云南的民族融合问题,但并没有对以施治为目的进入云南地区的移民与土著群体之间民族互嵌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表述。

一、移民的类型及构成

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主要是带有施治性质的,以镇守、屯戍、仕宦、谪迁、商旅等方式迁入云南的移民。本文所讨论的移民主要是蒙元时期以施治为目标进入云南的移民,不包括自发迁入并且尚未直接与国家网络建立联系的移民。

蒙元时期,镇戍军队成为云南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忽必烈率领元军攻打云南以及其后为稳定云南局势、以云南为军事据点攻打宋朝战略方针的制定等边疆经略措施使得大量镇戍军队进驻云南,成为蒙元时期迁入云南的移民主体。《元史》中记载镇戍云南的蒙古“诸王”约有20位,关于进入云南的军事移民的记载颇为丰富(见表1)。从中能看出,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镇戍军队主要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

汉军和新附宋军组成的^{[5]2508}。蒙古军的组成主体是蒙古人;探马赤军主要是北方的西域色目人(回回、契丹、畏兀儿在当时被称为色目人^[6]);汉军主要是由来自中原的汉人组成;新附宋军是在宋蒙战争中被降服的宋兵,主要是汉人。除此之外,居住于元军进攻大理途中必经之地的西番人因“善骑射”,成为元军南征云南地区的先锋骑兵的重要补充力量。南征途中西番兵被派留守于重要的关隘地区,故永宁、丽江及金沙江等地重要关隘均有西番人的分布。在云南行省建立以后,留守的元军在镇戍云南的过程中广置屯戍之地,具备“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特征^{[5]2507}。

表1 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主要军事移民

时间	事件	说明
至元九年(1272年)	“救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建都。”	“忙古带等十八族”为契丹军士,随忙古带留居大理地区屯戍
至元十一年(1274年)	“率襄阳生熟券军千人戍鸭池”;“忙古带率两路新军入滇”	以汉族群体为主
至元十五年(1278年)	云南行省建议以“渐长成丁怯困都等军”增补云南	蒙古语称十五岁以下逐渐达到服役条件的男子为“怯困都”;元初“怯困都军”主要是蒙古人。
至元二十年(1283年)	“调军益戍云南”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	十月曾增兵镇守金齿时载“旧尝以汉军、新附军三千人戍守,今再调探马赤、蒙古军二千人,令药刺海率赴之”	汉人、西域色目人、蒙古人等群体进入云南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领畏兀儿户一千戍合刺章(云南)”	畏兀儿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	“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军一千以行”	汉人、西域色目人
大德五年(1301年)	罗鬼女子蛇节、乌撒、乌蒙、东川、茫部诸蛮反叛。诏国杰将诸翼兵,合四川、云南、思播兵以讨之。	“国杰”即蒙元时期女真将领刘国杰。此次镇戍军队除女真外,还有蒙古人、汉人及当地土军。
大德七年(1303年)	“遣征缅甸回军万四千人还各戍”	由此推测当时驻扎于云南的回回人数不少
大德七年(1303年)	普而耶率瓮吉里军入滇	“瓮吉里军”主要为蒙古族

收稿日期:2023-07-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明时期云南族群空间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研究”(20FZS006)

作者简介:朱贵芳(2000—),女,云南保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历史地理研究。

表1(续)

大德九年(1305年)	云南行省请增戍兵未获允许,但“遣使诣诸路阅其当戍者遣之”	这批戍者族群结构大概比较复杂
至大元年(1308年)	经云南省丞进言,令征调于荆襄的畏兀儿一千人仍使归云南屯戍,“以佐征讨”	畏兀儿
至大四年(1311年)	为防范“八百媳妇、大小车里”,调四川蒙古军、汉军3000名入滇。	蒙古军、汉军
延祐三年(1316年)	发畏兀儿及新附汉军五千人到乌蒙军屯,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	畏兀儿

注:资料来源于明人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蒙元时期,仕宦、谪迁、商旅等是移民进入云南的另一种主要形式。至元二年(1264年)忽必烈规定,“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51]06}。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又规定,“河西、回回、畏兀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真)、契丹同汉人”^{[52]78}。类似规定直接影响了蒙元时期云南施治群体的族群结构。据夏光南统计,蒙元时期《元史》记载的云南仕宦群体凡79传100人,其中蒙古人31人、色目人32人,汉人及其他37人^[7]。其次,云南因“险远”等特殊的地理因素,成为被贬官员的谪降之地,如李京、董伦、王景、桡喇等。再次,存在仕宦为了在云南推行儒学,招募中原土人入滇的情况,比如,“率多中州士夫”或许就与脱脱木儿招募中原土人有关。另外,随着蒙元时期云南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日益密切,已有蒙古、回回和汉族等商旅深入云南的城镇或农村进行商贸活动,多发生于白族、彝族集聚的地方。由于蒙元时期进入云南为数不多的商旅移民,在行走的过程中定居于云南地区,逐渐融入土著群体中。值得注意的是仕宦、谪迁、商旅等这类型的移民进入云南可能存在家族性的入滇,即可能存在举家迁入云南的情况。比如,也速答儿及三代子孙均曾在云南任职。

总之,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主要是以镇守、屯戍、仕宦、谪迁、商旅等方式进入的蒙古人、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契丹、畏兀儿)、汉人、女真等。移民的类型决定了移民主要是以男性青壮年为主,“老幼妇”主要是随迁人员。由于长期施治,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群体有相当一部分因云南“险远”、道路难行,任期满后“无力返还”,故定居于云南,世世代代繁衍,逐渐形成人员庞大的移民群体。

二、移民的分布及民族互嵌类型

蒙元时期移民进入云南之后广泛分布于云南行省施治的各地,移民与云南土著群体在历史中以各种方式,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交流融合,逐渐建构出复合维度、多层次的民族互嵌格局。

1. 空间互嵌

不同民族在同一空间范围内因居住、工作、生活等必要高频率构成的物理空间互嵌是民族互嵌的必要前提^[8]。蒙元时期,经过秦汉以来民族迁徙与融合,云南地区土著群体的族群成分颇为复杂,呈现出“诸夷杂处”的族群分布态势。《云南志略》中记载元初云南地区土著群体主要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末些蛮、土獠蛮、野蛮、斡泥蛮、蒲蛮等^{[9]196},且各土著群体在空间上呈现出杂居的分布格局。根据《云南志略》有关记载梳理出蒙元时期云南土著群体的具体分布情况。第一,关于白人的分布,“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夷人,今转为白人矣”,在中庆路、威楚路、大理路、永昌府

等地皆有分布,此外曲靖路地区也有白人的分布^[10]。第二,李京的记载中罗罗即乌蛮,主要分布于云南曲靖路、乌蒙路、乌撒路等地区。此外,大理、丽江地区也应有罗罗的分布。至元十九年(1282年)张万家奴率四川、湖南兵征哈刺章,“恶昌、多兴、罗罗诸蛮皆叛”^{[53]881}。《元一统志》载,丽江路有麽些、白、罗落、冬闷、峨昌、撬、吐蕃、等群体,“参错而居”^[11]。第三,有关百夷的分布“北接吐蕃,南抵交趾”,可见蒙元时期云南百夷群体的分布范围广泛,主要聚居于云南的西南部、南部、东南部。第四,蒙元时期末些蛮主要分布于“大理北,与吐蕃接界,临金沙江”,即丽江路、柏兴府、鹤庆路等地区。第五,有关土獠蛮的分布,“叙州南、乌蒙北皆是”即主要聚居于云南的东北部。第六,有关野蛮的分布,“在寻传以西,散居岩谷”,即分布于寻传蛮西部地区。第七,有关斡泥蛮的分布,“在临安西南五百里,巢居山林”即主要分布于今红河州、普洱市辖区。除此之外,西双版纳、双柏、南华、洱源、昭通和镇雄等地也有少量散居于山谷的斡泥蛮。第八,有关蒲蛮的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大致是今保山、德宏、临沧、思茅、景东和西双版纳等地区。

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不仅迁入方式、族群结构比较复杂,分布格局也颇为复杂,但由于移民带有明确的施治性质,因此,其分布十分依赖施治网络。蒙古势力在云南地区的设治经历了三次变化,先设五城治理,后设十九万户府,建立云南行省后设立路、府、州、县制。云南行省下辖“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51]457}此外还设置宣慰司、宣抚司等,与路、府、州、县参差治理。蒙元时期云南施治网络遍布,各级行政治理中心内均有一定数量的移民的分布。因此,移民的迁入地分布广泛,依赖于城镇、屯地、站赤、驿堡、铺舍、哨所等施治节点。

据考证以镇戍为目的的元军军屯在云南的大理路(永昌府、腾冲府)、鹤庆路、威楚路、武定路、中庆路、仁德府、曲靖路、澂江路、临安路、乌蒙路、梁千户翼军屯等各地区均有分布^{[52]508}。前已述及元军镇戍军队组成较为复杂,主要有蒙古人、汉人、回回、契丹、畏兀儿、女真等。元军军屯一般在屯戍过程中,也会吸纳当地的罗罗、白人组成爨夷军和民户。在屯戍的地区逐渐呈现出蒙古人、汉人、回回、契丹、畏兀儿、女真等移民群体与白人、罗罗等诸多土著群体相互交流融合,在空间上呈现出互嵌的态势。蒙元时期,蒙古人、回回、畏兀儿主要通过屯戍、仕宦、商旅等方式进入云南的群体主要分布于交通沿线地区。对施治者重要的地区,比如,中庆路、大理路、威楚路、临安路以及乌蒙路等地是移民重要的聚居中心区。契丹人以随军的形式进入云南,据考证其主要被授予永昌府金齿等处宣抚司、腾越及鹤庆宣抚司的宣抚使,尔后向周边移动并融入土著^[12]。因此,契丹人主要分布于鹤庆路、永昌府、腾冲府、顺宁府西北部、柔远路、镇康路、茫施路、麓川路等地区,与白人、罗罗、百夷、末些蛮等土著群体相互交流融合,在空间上呈现出互嵌的态势。西番兵作为元军南征途中重要的兵源补充力量,留守于南征途中重要的关隘地区。故元军入滇途中的永宁、蒗蕨、丽江、中甸及金沙江等地重要关隘均有西番人的分布。西番兵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与末

些蛮等土著群体相互交流融合,在空间上呈现出互嵌的态势。

公元1382年,明三将军平定云南时,云南的蒙古官吏遍布3路7州6县。以此可以看出,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遍布云南行省直接施治的各路州县。但移民数量的分布因地区施治的重要程度不同而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比如,昆明、大理、永昌、曲靖等治所的移民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治所。马可·波罗曾描述元代云南行省治所所在地押赤城“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13],这能反映出有大量移民聚居于此。蒙元时期滇西重镇大理也聚居了大量移民。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平定滇东后,滇西蒙古人群即据大理佛光寨抵抗明军,退守于鹤庆的蒙古官员被俘获时有参政等官员达67人之多^[14]。

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在空间分布上依赖施治网络定居云南各地,主要分布在城镇、屯地、站赤、驿堡、铺舍、哨所等地,空间上已形成了与土著族群杂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加之移民在区域内流动及与土著群体有效交流的增加,逐渐构建出移民与土著群体空间互嵌的分布格局。

2. 政治互嵌

蒙元政权属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云南土著民族的歧视较少。蒙元政权认识到云南地理区位的重要性,将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治理体系中,排出了“内华夏外夷狄”的治理思想。蒙元政权受汉唐以来中原对边地治理中“恩威并用”“因俗而治”等思想的影响,以羁縻的政策治理云南,在云南实行中原王朝与地方土官共同施治的措施,构筑出“蒙夷参治”的施治格局。从政治层面上看,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与云南土官分属于不同的政治身份。移民群体经中原王朝调驻进入云南,属于王朝户籍管理中的“军户”“编户”;而地方土官虽属于“朝廷官员”,但拥有一定的“特权”,所辖土地及土民不属于王朝的“编户”,而是“化外自治”。换言之,移民与地方土官以是否属于王朝编户齐民辨别其分属的不同政治体系,政治身份具有明显差异。

一方面,蒙元政权派宗王、将帅等移民“共镇”治理云南。比如,元军平定云南后派宗王与大将兀良合台等人镇戍,成为蒙元时期云南的重要移民来源^[15]。这些移民奉令镇守、治理云南,带着强烈的“皇命”荣耀,对王朝国家及华夏政权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因此,移民迁入云南给云南带来一股政治资源以及一些新的政治身份,为云南地区华夏化进程的推进注入了新的力量。但频繁的军事征调、赋税政策以及部分地方官员的腐败使得一些移民,特别是军屯的士兵,放弃编户身份进入赋役政策相对较为宽松的地区。如《元史》中记载“八番、顺元等处初隶湖广,后改隶云南,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16]元代进入滇西地区的契丹群体到了明代就被视为“土司”范畴,即被视为本土群体。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就称:“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16]。移民放弃自己的编户身份,其政治身份发生了巨大转变。

另一方面,大量土著群体被吸纳进蒙元政权的施治中,由元廷授职隶属于国家官吏体系。龚荫《全国土司总表》记载元代云南行省的土官武职304家,文职283家,云南土官的分布范围几乎遍布整个行省。土官虽享有一定的权力,但其承袭、升迁、惩处等受制于王朝。同时土官必须承担王朝规定的

赋税等,有协助统治者带兵从征的义务。比如,公元1253年,蒙古统治者给大理国君主段兴智赐号,并封其为中庆路八府总管,继续掌管事务。中原王朝设立大理路军民总管府监视段氏、利用段氏抚恤归附招降。迁入云南的移民与当地土官之间在空间上多民族互嵌,使得“汉人”“汉文化”的身份和地位对当地土官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土著通过“谱系嫁接”、祖先再造等方式与华夏文化建立联系的现象可看作是力图改变其政治身份的表现。此方面的案例诸多,特别是云南的白族群体通过将自己的姓氏与华夏姓氏相联系,使之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蒙元时期云南土官等群体逐渐积极学习华夏文化,试图摆脱“蛮夷”身份,拥有“编户齐民”身份的政治理想。

蒙元时期云南在政治上实行“蒙夷共治”的施治措施,移民与土官乃至土著之间联系紧密。土官“攀附华夏”,试图进入华夏,完成施治层面上的华夏化与移民放弃其华夏政治身份进入土著管控地区被“夷化”均是蒙元时期云南地区移民与土著群体华夏政治身份转变与政治互嵌的体现。

3. 经济互嵌

蒙元时期云南地区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资源的互嵌是移民与土著群体在经济上互嵌的开端^[17]。移民迁出地较为发达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土著群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土著群体因此逐渐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随移民进入的生产资料等经济发展方式。屯垦、屯戍等国家治边措施使得移民与土著群体在土地资源方面发生互嵌。

首先,蒙元时期屯戍制度不仅为云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而且为云南地区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生活经验,助推云南经济发展。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有一部分为了供给军需,在云南大力发展屯戍经济,设有军民屯田点十二处,范围几乎涉及云南全省。成宗大德年间,云南的税入粮为277 719石,位居全国第五位^{[5]2360-2361},从中可窥探出蒙元政权对屯戍的重视程度助推云南农业生产。同时,进入云南的移民为云南地区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著居民的生产方式。

表2 蒙元政权赈恤云南的部分事件

时间	事件
至治三年(1323)	“赈恤云南、广海、八番等处戍军”
泰定四年(1327)	“乌撒、武定二路饥,赈粮、钞有差”
至顺二年(1331)	“云南行省钞十万锭,以备军资、民食”
至顺三年(1332)	“云南大理、中庆等路大饥,赈钞十万锭”
元统二年(1334)	“发钞十万锭,差官赈恤”

注:资料来源于(明)宋濂等撰:《元史》卷7,中华书局出版1976年版。

其次,蒙元政权在云南地区实行惠农抚恤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一,朝廷给予屯垦的军户、民户惠农抚恤政策,为其提供种子等生产工具;将无主荒地给予没有土地的民户耕种等。屯田的成员除了移民外,还吸纳当地土军以及一些当地编民、无户籍的民众。据《元史》记载云南有土军参加的军屯共九处,民屯数量也占一定比例。《元史》有关军民屯田的记载中,中庆路给予土军户“田二百三十四双”(约936亩)、民户“田一万七千二十二双”(约68 088亩),曲靖等地官给予田“一千四百八十双”(约5 920亩)^{[5]2376-2377}。第二,蒙元政权试图通过赈粮、赈钞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恢复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见表2)。除了赈粮、赈钞外,

还通过免除地租的方式抚恤云南。比如,《元史》记载至顺三年王朝免除云南行省三年的田租。这些惠农抚恤云南的政策体现了蒙元政权对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重视程度。

另外,蒙元时期,王朝将屯田增户作为衡量官员奖惩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促使官员群体重视云南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地为云南经济发展采取系列措施。第一,官员群体将带来的知识、技术与云南实际情况相结合,向云南土著群体传播相对先进的农耕知识及生产技术等。第二,官员群体因地制宜地制定赋税政策,极大地鼓励了云南民众生产的积极性。如赛典赤考察云南各地实际情况后,制定了因地制宜的赋税政策,将“牛、种、耒耜、蓑笠之具”以“夷人输租二斗”的方式租借给民众,教民众如何播种^①;张立道教云南民众饲养蚕桑,获得“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的成就。第三,官员群体在云南大力兴修水利,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经济发展。在云南重视兴修水利的官员群体人数众多,如赛典赤“为陂池以备水旱”;张立道“役丁夫二千人”治理滇池,疏通水源,使滇池流域成片土地皆成为良田;郭松年称凤仪的神庄江流域兴修水利灌溉,旱灾减少,百姓因此富庶。总之,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官员群体作为云南地区的直接施治者,在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云南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和助推者。

综上所述,蒙元时期,王朝国家及屯戍、屯垦、官员等移民对云南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至关重要。蒙元时期移民通过为云南带来劳动力、先进的生产生活经验、惠农抚恤的政策、经济发展的引导者等方式,促进云南经济恢复与发展。云南土著群体在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下,积极吸收相对先进的生产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移民与云南土著群体在经济交流、生产生活方式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构筑出经济上互嵌的态势。

4. 文化互嵌

空间、政治、经济互嵌的环境为多维度的文化互动搭建了平台^[18]。蒙元时期移民与云南土著群体,在空间互嵌的基础上,因通婚、政治交流、经济交流等原因逐渐形成互嵌的社会环境。不同群体的民族文化在互嵌的社会环境中逐渐进行重构,发生文化迁移^[19]。移民与土著群体在接触的过程中,彼此的新观念、新行为方式会互相影响,使得原本的观念及行为方式等发生改变。蒙元时期,移民与土著群体通过文化接触、文化涵化等途径使得民族间共同性的文化要素增加是文化互嵌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是通婚是移民与土著群体形成文化互嵌格局的一个重要途径。蒙元时期,移民在婚姻文化上大多都与其他族群通婚。特别是因从军滞留、赋役问题以及社会动乱等落籍山区的移民,与土著群体通婚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大多最后融入土著群体。民国《昭通志稿》记载在改土之前入迁的汉人“土司留配夷女,或因掳掠而至,积久与夷女相合,其所生男女遂名假汉人。从尚夷习,性殊狡猾。”这部分移民与土著通婚,“生子并化为蛮”,但其本身及子女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保留着汉族诸多的文化特征,“婚姻服食皆与汉人同”^[20]。族群通婚可能导致移民融入土著群体或土著群体融入移民的情况。据学界考证,元代通海至曲陀关蒙古人的发展有其他群体因通婚融入蒙古人的情况,以致元末已有三四千人,但到

了20世纪70年代仍然如此,原因是当地大部分的蒙古人在元代后又融入其他群体。移民与土著群体通婚可能造成移民“夷化”的结果,但也加速了土著群体与移民文化涵化的进程。

二是移民与土著群体因治理及生产生活需要等互相适应、采借。首先,在史籍中常出现类似“俗本于汉”的说法。蒙元时期,郭松年造访云南时观察到云南建筑、语言等与华夏类似,并指出这是历代学习汉文化的结果。李京也指出云南有族群在语言及书写等方面的近汉特征^{[9]196}。其次,蒙元时期史籍中常记载夷俗的“鄙陋”及蒙元政权对夷俗的改化成效等,但这只是“汉文化”与云南土著文化在交流与认同的一个侧面,也有移民在交流中认同、适应土著文化的情况。赛典赤在考察云南后,以“民众不便”奏请元廷允许以贝代替钱,元廷“许仍其俗”^{[5]3063}。从中可以看出,施治者考虑并认可云南的文化。最后,屯戍等移民将先进的生产生活经验带进云南的同时,因地域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在此过程中出现效仿土著的情况。

三是随着文化互嵌程度的深入,移民与土著群体产生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是移民与土著群体文化互嵌的一种表现形式。土著群体出于某种原因通过谱系嫁接、层累造成、合宗造谱等方式形成华夏祖先记忆。华夏祖先记忆的形成正是基于土著群体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四是蒙元时期,元廷为了在云南实现改化夷俗的目标,在此大力推行儒学,影响着王朝文化向云南边缘地区深入延伸。蒙元时期,移民是推行儒学,传播华夏文化的主要载体。至元十一年,赛典赤在云南开创庙学;至元十五年,张立道在中庆建孔子庙,专门聘请蜀人教授;至元十九年、二十九年,元廷多次下令在云南各路建学,虽未实现但能够看出元政权对在云南地区推广儒学文化的意图。这一举措促使土著群体入学儒学,使得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接触、碰撞,推动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互嵌格局的构建。

移民进入云南后与土著“杂处”的空间互嵌格局,有利于移民文化与土著文明的交流、涵化。随着移民进入的“先进文化”具有主流地位和向心力的作用^[21],移民文化对周围土著文化的多个层面都具有辐射效应,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在长期与云南本土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两者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语言、习俗、信仰、饮食、节日等方面呈现出“互相类似”的文化现象,呈现出文化交流互融的互嵌格局。

三、民族互嵌对移民地域认同的影响

蒙元时期关于云南移民群体地域认同问题可考证的资料并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移民的地域认同问题确实存在。移民与土著群体在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嵌,特别是与土著群体通婚,必然会影响移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适应,该影响因群体的不同表现出个体差异。蒙元时期移民群体进入云南后既有逐渐产生地域认同的,也有长期秉持着不乐观地域认同态度的。

蒙元时期云南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交通不便加之入滇途中瘴毒广布,使得移民进入云南的旅程极为艰难。虽然通过镇戍、仕宦、谪迁等方式进入云南的移民在元

张洪.南夷书.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4.

廷提供的政策及物质保障下,生存环境逐步改善,但移民大多数是在王朝的要求下进入云南的。基于蒙元时期及以前云南地区多呈现出“险远”“瘴毒”“诸夷杂处”“奇风异俗”等与中原地区相反的边地形象^[22],移民对云南的地域认知多倾向于负面。蒙元时期在有关云南的诗文作品中送行赴滇诗多表露出“赴死”的意境,入滇的宦宦诗既带有浓浓的思乡之苦,又含对前程的迷茫,入滇为官不异于遭到贬谪。类似于杜长德入滇为官时“谁怜万死投荒地,幸行生残念已灰”的诗句不胜枚举。这反映出移民迁入云南时,对云南地域文化认同存在的问题。《云南志略序》记载称当时的士大夫“乐事朝廷,不乐外宦”^[9],从侧面反映出部分士人对云南并不乐观的地域认同态度。方回在《桐江续集·后乐集序》中称云南“人所惮往”,直接点明了时人对云南的一般态度。移民的这一认知倾向在历史记忆中也有所体现,蒙元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在数年后仍强调自己迁出地祖籍的身份,借以强化中原祖先的记忆,这从侧面反映出移民对迁入地地域认同观念并不强烈。例如,李伯强在云南为官多年,元末时写下诸如“苍山不隔他乡梦,洱水犹含去国羞”等许多表达对家乡思念的诗句。

移民留居云南,在民族互嵌格局构筑的过程中与土著群体在居住空间上杂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增强,使得移民地域认同感逐渐强烈。长期的民族互嵌格局使得移民与土著群体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民族交融过程中,促进移民的地域认同。特别是移民与土著群体通婚,使得移民逐步适应、认同云南土著群体的文化。移民定居云南后,在民族互嵌格局构筑的过程中,移民与土著群体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出现文化适应现象。如蒙古人移民的语言、文字在进入云南后发生的改变,出现了土著群体的民族语言;蒙古元帅阿帖木耳使用汉文作诗词等。除此之外,在移民与土著群体民族互嵌过程中,部分移民群体对云南地域认同增强,融入土著群体行列。

总之,虽元明时期云南的移民存在地域认同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也可观察到移民地域认同的持续增强。这主要得益于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及受此影响而产生的族群通

婚、文化适应等。在此过程中,移民与土著群体又会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移民的地域认同。当然,除了这些客观的因素外,移民的认知倾向、历史记忆、族群观念等也是影响其地域认同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01).
- [2]王静.近十年来国内“民族互嵌”理论研究综述[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2(2).
- [3]陈文元.卫所移民、社会流动与民族互嵌——以湖广施州卫为考察中心[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唐欢,田阡.明清以来黔东南多民族互嵌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5);陈文元.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互嵌[J].广西民族研究,2020(6).
- [4]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J].民族研究,2003(2).
- [5]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6]杨兆钧.云南回族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7;杨梅骧.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考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3.
- [7]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8:75-78.
- [8]张彦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互嵌式治理初探[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9]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合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 [10]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296.
- [11]李兰盼.等.元一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6:561.
- [12]杨梅骧.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考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14-15.
- [13][意]马可·波罗,等.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86.
- [14]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8063-8135.
- [15]罗群,黄丰富.“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2(1).
- [16]陈文修.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
- [17]杨洪林.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明清时期为中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
- [18]王彦龙.民族互嵌与文化特质的共享生成——基于“托茂人”与“家西番”文化变迁的比较研究[J].民族论坛,2022(2).
- [19]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8.
- [20]包鸣泉.等.民国昭通县志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379.
- [21]陈文元.卫所移民、社会流动与民族互嵌——以湖广施州卫为考察中心[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22]孙俊.多重镜像:元明时期云南游历资料中的边地形象及其知识生产[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4).

Ethnic Inter-Embedding and Regional Identity of Yunnan Immigrants in the Mongol-Yuan Dynasties

Zhu Guifang

(Faculty of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ongol-Yuan Dynasty,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gradually increased its strength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Yunnan, and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entering Yunna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s a resul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thnic integration between Central Plains and Yunnan were further developed. Mongolian, Semu, Han, Jurchen and other immigrants who moved to Yunnan by means of garrison, official appointment, business travel, etc.,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administration network in places such as government offices, villages, stations, post houses, shops and outposts, forming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ixed residence with indigenous ethnic groups in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hen gradually forming a pattern of ethnic embeddedness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Key words: national mutual embedded; Mongol-Yuan period; immigration; indigenous

[责任编辑:师清芳]

(上接第138页)

- [8]董夏红.基于《孤独》与《莫扎特安魂曲》谈舞蹈与音乐协作的两种类型[J].北方音乐,2020(22).
- [9]张勇,丁文利,高华.从世博圆形剧场看制作电视科技节目的舞美视觉空间把握[J].影视制作,2018,24(6).

- [10]蔡英华.突破疆界的燕赵舞美——记首届河北省舞台美术作品展暨舞台美术与科技设备交流展[J].大舞台,2013(1).

Creating Dance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ance Beauty Technology

Ding Siwen

(School of Music,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art form, dance art needs to get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level, various high-tech mean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dance creation, which promotes its innovation in concepts, methods, and cont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not only improving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dance creation, but also making dance art more responsive to people's aesthetic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ance beauty technology,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stage effect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new media technology into dance creation, while innovating traditional dance beauty.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makes a study on the dance creation method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ance beauty technology, develops the ways, means and effects of modern dance art technology in dance works, and analyzes the dance creation method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ance beauty technolog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Key words: modern dance beaut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dance beauty technology; dance creation; mode of artistic creation

[责任编辑:李慧慧]